

# 古人类语言的研究方法

刘 诚

(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 导 言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研究人类发展规律,除开从形态进化去“知其然”以外,还必须从劳动和语言这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去“知其所以然”。因此,对古人类语言的研究,就应当摆在人类学中的重要位置上。

古人类语言的研究,既属于人类学的领域,又属于语言学的领域。“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要完成这个主要任务,必须全面地占有语言材料。要全面地占有语言材料,仅仅考察有文字记载的语言是很不够的,还必须考察无文字记载的远古时期的语言,才能探本穷源,清理语言演变的全过程。因此,对古人类语言的研究,也应当摆在语言学中的重要位置上。

古人类语言的研究课题包括语言发生和语言发展两个方面。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虽然多少年来学者们对它进行过辛勤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是距离真正的答案还相当遥远。一般的缺点是:抽象的逻辑推理多于具体的科学分析,有时还不得不借助想象以济其穷。其原因有两方面:客观原因是地下发掘出来的材料不够充分;主观原因是研究的方法不够完善。

本文着重讨论研究方法问题。由于作者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实际材料掌握不够,只能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作为引玉之砖抛出来。

## 一、方 法 论

方法论是受世界观支配的,而方法又是受方法论支配的。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同样的方法实际意义不同,运用方式不同,结论也往往不同。

在古人类语言的研究领域里,历来存在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两种世界观和两种方法论的斗争。只要翻开一本语言学书籍,这种斗争就在我们眼前剧烈地开展着。我们不打算在这篇短文里复述那些细节,只表明自己的观点: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批判和继承资产阶级学者所使用过的某些方法。

研究古人类的语言,必须注意它跟相关事物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也就是注意它跟相关事物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能深入它的本质,掌握它的规律。

先谈共同点。

语言是语音和语义结合的、同抽象思维紧密联系的、属于第二信号系统的、社会斗争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是一种既不属于经济基础、又不属于上层建筑的特殊的社会现象；是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主要是生产劳动的实践的推动下，发生和发展出来的。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社会性是语言的一般的本质属性。古人类语言也不例外。因此，研究古人类语言必须注意社会性，单从化石的形态方面作出论断，就抛弃了它的本质属性，其结论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再谈特殊点。

古人类语言是一种已经消逝了的、没有文字记载的语言，有它自己的特殊点。这特殊点就是它的特殊矛盾，构成了特殊的本质属性：既区别于现代的语言和古代的有文字记载的语言，又区别于人的猿类祖先的声音信号。在古人类语言中，正在形成中的人的语言和已经形成的人的语言，各有特殊矛盾；在已经形成的人的语言中，猿人、古人、新人的语言，也各有特殊矛盾。这些特殊矛盾，构成了各自的特殊本质属性，这正是我们还没有研究出来而应该着重研究的。如果不注意这些特殊矛盾，笼统地作出论断，那么其结论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一般化的。

恩格斯科学地论述了人类的发生和发展规律，同时也论述了语言的发生和发展规律。这光辉的学说，是我们批判古人类语言的研究方面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锐利武器。他那“分节语的产生是人类蒙昧时代低级阶段的主要成就”的著名论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给我们研究古人类语言以很大的启示。

下面分直接法、间接法、综合法三方面，来探讨研究古人类语言的特殊方法。

## 二、直接法

直接法就是根据地下发掘的材料直接论证的方法。包括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两方面。

### （一）利用古人类化石，复原言语中枢和言语器官，来推测语言发展的状况

首先运用解剖学的方法，利用古人类化石，复原言语中枢和言语器官；其次运用语音学的方法，分析发音和听音的生理基础；再次运用两个信号系统的学说，分析言语机能；最后结合其他方法，推测语言发生和发展状况。

运用这个方法，必须把言语器官同其他器官联系起来观察，决不能单凭言语器官或言语器官的某一部分作出论断，否则会得出片面性的结论。因为根据生长相关律，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器官的特定形态，总是同其他器官的某些形态相联系的，个别器官形态的改变，总是引起其他器官形态的改变。

言语器官包括发音器官和听音器官两个矛盾的对立面，两者是息息相关的。先天性的或早期的聋哑人，“十聋九哑”，这是很好的证明。如果抛开听音器官，只考察发音器官；甚至在发音器官中抛开肺和声带，只考察口腔、鼻腔共鸣器部分；那么，所作的结论必然是片面的。

言语器官同言语中枢构成另一个矛盾的对立面，其中言语中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使言语器官还不太完善，只要言语中枢能够执行指挥职能，就能够说话，虽然不一定说得好；大舌头、兔唇之类言语器官缺憾的人就是如此。反之，言语器官即使非常完善，只要言

语中枢发生病变,就不能够说话,即使模糊的言语也说不出;脑膜炎后遗症患者就是如此。可见忽视了言语中枢的主导作用,所作的结论也是片面的。

言语中枢和言语器官同四肢——特别是手——也是分不开的。没有手脚的分工,手的劳动,言语中枢和言语器官是不可能形成和发展的。从四肢的发展水平也可以推知言语中枢和言语器官及其机能的发展水平。

总之,要从人类化石的有机整体进行考察,不能孤立地考察言语器官。这是就个体来说的。推而广之,还必须注意个体与个体之间、属种与属种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人类化石的个体,即使是同一个属种,其言语中枢和言语器官未必全同。在进行器官复原、研究其言语机能的时候,除开抽样要注意代表性以外,还要注意同时性系列的横的联系。言语中枢和言语器官及其机能是处在不断进化过程中的,南猿——猿人——古人——新人,迥然不同;但有亦此亦彼的中间环节。在研究言语中枢和言语器官及其机能时,不可忽略历时性系列的纵的联系。用坐标来比喻:以横轴比喻同时性系列,以纵轴比喻历时性系列,以纵轴和横轴上的数值所标志的图象比喻所求的答案。

## (二) 利用文化遗物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和意识形态,来推测语言状况

社会状况和意识形态,从物质文化上直接反映出来;而语言同社会、同意识不可分割;因此,从物质文化的折光,可以间接地推测语言状况,不过比较粗略而已。例如:制造和使用加工的石器,必须具备两个前提:第一,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对石料性能和石器性能的关系、对石器性能和劳动对象的关系,都能够进行抽象和概括,制作前成竹在胸,制作后运用如意;第二,有一定的社会组织,保证和推动工作进行。可见制造和使用加工的石器,是一种有意识的而非本能的、社会性的而非个人的行为。要具备上述两个前提,完成这种行为,又必须以语言为条件。

根据上述论点,可以对古人类语言进行推测。例如:根据周口店文化可以推测北京猿人的语言状况。北京猿人以四、五十人组成原始群的社会,能够制造粗石器,能够猎获大野兽,能够用火熟食。结合他们的人体化石,特别是头骨化石,可以推知他们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社会组织能力。从而推知:他们的语言相当进步,决不是分节语的创始者;但是,还没有达到词和句分化、组词成句的水平;他们的语言在狭隘的社会里流通,表述单位(词和句尚未分化的语言单位,相当于却不相等于现代民族语言的独词句)很贫乏,限于生活和劳动中常见事物的范围,如石器、木棒、水、火、朴树子、肿骨鹿之类。

总之,“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发展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斯大林)这是研究古人类语言的重要原则。

## 三、间接法

间接法就是利用与古人类语言有相同点、相似点、相关点的事物,进行间接论证的方法。我们参考某些学者提出过的一些方法,归纳、修改、补充成为下列五种。

### (一) 从现代民族语言和有文字记载的古代语言的内在发展规律来推测

比较语言学,特别是其中的语言类型学,探索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点,找出共同规律,对研究古人类语言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因为现代的和古代的有文字的语言,与古人类语言有相同点,所以能够互相类比。

但是,从古代有文字记载的语言到现代语言,最多只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结构复杂,同古人类语言差别很大。决不能把仅有几千年历史的语言的发展规律,去硬套有几百万年历史的古人类语言。例如:有些民族语言,在上古或中古时期,语音系统比较复杂,以后逐渐简化。如果以此为依据,证明古人类语言的语音到现代人类语言的语音,是沿着从繁到简的规律发展的,那么,就是以偏概全。有的语言学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 (二) 从现代民族语言中的古老成分来推测

事物经过长期演变,虽然面目全非,但是往往保留一些遗迹。例如:人类的尾巴退化了,却保留了尾椎骨;石刀废弃了,尖劈省力的原理及其雏形却承继下来。同理,古人类语言消逝了,却在现代语言中残存某些成分。由于语言有巨大的稳固性,演变非常缓慢,“可以推想,现代语言的要素还在奴隶时代以前的远古时期就已奠定了基础。”(斯大林)

现代语言感叹词的某些部分似乎可以看作古老成分(这跟语言起源于感叹的错误论点不是一码事)。以汉语的感叹词为例来说明这个论点。它的语音形式构造简单,接近猿类本能的叫声;语义内容很不固定,表示的概念比较模糊。它不直接指称事物,只同特定的情境联系,表达某种感情。它常常充当独词句或句子的独立成分。它从古至今变化不大,同时缺乏能产性(productivity)。例如:

啊 [a] 变更字调和语调,分别表示赞叹、惊异、疑问、反诘、应诺、困惑、醒悟等意思。

诨诨 [ji] 表示拒绝、不服气等意思。小孩争吵斗气,往往连续发这个音。

啧啧 [tsr] 表示赞赏、轻蔑、恶心、疼痛等意思。口语发成单纯辅音,是吸气音。

现代民族语言中的古老成分,当然不限于感叹词,名词、动词中也可能存在古老成分。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很多语言的动词命令式只有词干而没有词缀,可能是史前语言这一特点的反映。(梁杰耶夫《语言的起源与最初的发展》,载《语言学资料》1963年2—3期)我们认为这不是普遍规律,汉语就不符合这个规律。

### (三) 从不同民族的儿童掌握语言的规律来推测

恩格斯指出:“正如母腹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是这个缩影更加简略一些罢了。”(《自然辩证法》)这话的意思是:人类几百万年的精神发展的过程可以从儿童几年的精神发展的过程中重演出来。精神包括思维,而思维同语言不可分割。因此,从儿童言语机能的发展过程中,可以依稀地看到古人类言语机能发展的遗迹。婴儿最先和最易学会的语音,可能是古人类语音中最原始或较原始的部分。

在发育正常、语言环境良好的情况下,一般说来,儿童出生后开始发出接近猿类的本能的叫声,很快就分化成分明的音节。第三个月左右,开始咿哑学语,回答外界的言语刺

激。第五个月左右,言语中枢产生综合过程,将外界的言语刺激汇合成独词句。两岁左右,基本上学会日常对话的简单句子。这是大概的不周密的统计,不同民族的儿童或同一民族的不同儿童,言语机能发展过程往往差别很大,目前还缺乏全面的精确的数据。

必须指出:儿童学习语言,一开始就是在有现成语言的社会里进行的,而古人类的语言发生和发展的原始时期,则是从无到有地创造;因此,两者条件不同,可以比拟而不能混同。

#### (四) 从失语症患者和白癡症患者的言语机能来推测

失语症是言语中枢病变引起的言语功能的障碍。早有人指出:失语症患者丧失言语功能的过程同儿童学会言语的过程恰巧相反。失语症患者最先消失的语音,可能是最难发的语音,因而也可能是人类最晚出现的语音;反之,最后消失的语音,可能是最易发的语音,因而也可能是最早出现的语音。(梁杰耶夫)在医学上,失语症的研究是很不够的,缺乏可靠的证据。但是,这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

必须指出:失语症患者是现代人类,他的言语中枢的构造及其机能,同古人类差别很大;而且失语症是病理现象,跟古人类言语的生理现象不同;因此,两者可以参照而不能类比。

白癡症是由于胎儿期或婴儿早期受疾病或药物损害所造成的大脑发育障碍。在部分患者中,遗传因素有一定影响。不少患者的言语功能很差。一般的白癡症对研究古人类言语机能没有或少有参考价值。如果经过严格检验,确非病理的而纯属遗传的白癡症,那么,似乎可以看作遗传返祖现象,可以同古人类大脑机能进行类比。可惜这样的病例极其罕见。

#### (五) 从现代类人猿和现代鸟类的声音信号来推测

有些学者研究现代类人猿和现代鸟类的声音信号,借以探索人类语言的起源。但是,这方法只能参考,不能类比。理由如下:

第一,现代类人猿和现代鸟类的声音信号跟人类的语言本质不同:前者属第一信号系统,后者属第二信号系统;前者只同特定的情境(如饥饿、危险、求偶、愤怒等)相联系,没有能产性,没有社会性,后者同抽象思维相联系,有能产性,有社会性。鸚鵡模仿人类说话,即使维妙维肖,也不能与人类的语言混同。

第二,现代类人猿的声音信号跟古猿的声音信号,不可同年而语。不可能设想:从古猿到现代类人猿的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发音器官和听音器官及其机能没有变化。

第三,在模仿人类说话的能力方面,进化水平较高的现代类人猿(如黑猩猩)反而比不上进化水平较低的现代鸟类(如鸚鵡)。鸟类脑量的相对数值高于类人猿,用这个事实作解答,还不能令人信服。

### 四、综合法

综合法是将各种方法加以综合运用。运用综合法时,要以直接法为主,以间接法为辅;在直接法中,又以人类化石的研究为主,以文化遗物的研究为辅。

以北京猿人语言的研究为例说明之。

选择一个代表性强的较完整的北京猿人成年个体的化石,摩印脑纹,复原言语中枢和言语器官;接着把比北京猿人较早和较晚以及同时代的古人类化石的有关部分,互相比对,作出单独的和对照的详实描写,得出同时性系列和历时性系列的数据;然后对照周口店文化,研究北京猿人的言语机能。例如:考察北京猿人音位系统中有无元音 [a],运用语音学原理,以发出元音 [a] 的生理条件、物理条件、社会条件来衡量,根据北京猿人的言语机能,作出初步推测,然后参考下列间接材料作出论断。

(一) 比较语言学中的发生比较和类型比较,确定有文字记载的古代语言都有元音 [a],现代民族语言都有元音 [i]、[u]、[a] 的对立。

(二) 儿童啞哑学语,发元音 [a] 较早较易,并且很早就学会 [pa]、[ma] 这类音节。

(三) 白癡症患者和先天性聋哑人发元音 [a] 一般不感困难;失语症患者的元音 [a] 消失较迟。

如此等等。最后可以判断北京猿人语音系统中有无元音 [a],并是否能清晰地发出来。其他音位可以按照同样方法调查,最后可以对北京猿人的音位系统作出粗略的描写。

上面的例子,只是从语音方面来讨论。但是语音并不等于语言,语音演变并不等于语言演变。全面地讨论北京猿人的语言,情况复杂一些,方式繁难一些。

## 结 语

**“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他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根据上述指导性原则,我们主张从语言的社会本质着眼,从言语中枢和言语器官及其机能入手,综合地运用各种方法,研究古人类语言的内部矛盾性。必须废止静止的、孤立的、主观的、片面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代之以发展的、联系的、客观的、全面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古人类语言有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性,因而必须采用特殊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可以创立“古人类语言学”,作为古人类学和语言学的临界科学;而这种新的科学,除开古人类学和语言学以外,还需要其他有关科学的密切配合。

我们主张古为今用,立足现在,回首过去,放眼将来;反对孔丘的“信而好古”和韩愈的“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之类的复古倒退思想。研究古人类语言的目的是寻求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而寻求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有两个目标:从古人类学的角度看,是为了从劳动和语言这两个重要的推动力,去探索人类发展的“所以然”;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是为了现在的语言工作,并预测将来的语言发展的前景。

(1974年4月24日收到)